

冷戰優先還是貿易優先？ ——1958年中國對東南亞出口 躍進政策探析

●姚昱、李海媚

摘要：1958年初中國對東南亞採取了出口躍進政策，相關出口驟增不僅引發了國際輿論的關注，更令東南亞國家自10月開始嚴格限制中國商品進口。雖然中國於1959年初主動收縮了這一出口任務，但已難改變中國與馬來亞等東南亞國家關係走向低潮的趨勢。本文着重探討1958年中國對東南亞出口政策的內容及其演變，認為1958年前後該政策之所以起伏巨大，除與大躍進運動、中國政府的強大動員能力以及部門、地方之間的競爭等因素有關外，更是全球冷戰此時發生的諸多重大變化的結果。中國與兄弟國家的貿易矛盾，西方貿易管制政策的放鬆，東西方經濟競賽的加劇，中國與英國、日本的外交糾紛，以及中國對中立主義國家印度的拉攏等，都令中國在對東南亞出口方面存在經濟定位與政治定位之間的嚴重衝突，並在實踐中出現較大混亂。而東南亞國家的激烈反應則與1958年東西方「經濟冷戰」正向第三世界迅速擴散有關。

關鍵詞：中國 東南亞 出口躍進 經濟冷戰 貿易

從1958年初開始，中國內地大量商品突然低價湧入馬來亞聯合邦（馬來西亞前身）、新加坡（當時仍隸屬馬來亞）、泰國等東南亞市場以及香港和澳門地區，當時諸多媒體驚呼中國正在對東南亞發動一場「貿易攻勢」（trade offensive）^①。這一變化不僅令中國與英國、日本在東南亞市場展開激烈競爭，東南亞各國更於同年10月開始以保護本國產業為由，先後針對中國商品採取了嚴厲的歧視性進口政策^②。雖然中國反應克制，並自1959年初大幅收縮了相關出口^③，但中國的溫和回應未能阻止此次貿易摩擦所造成的嚴重負面影響，1956年以來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因雙邊貿易快速發展而帶動的雙邊關係全面發

* 本文為2018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戰後美國對亞非不結盟國家經濟政策研究」（項目編號：18BSS019）的階段性成果。本文作者在此特別感謝韓鋼、王海光、歐陽湘老師的指點和幫助。

展的勢頭就此消失。這一事件雖影響巨大，但中國官方出版物對此問題幾無涉及^④。而現有學術研究不僅數量較少，更在分析重點、解釋路徑等方面存在較大分歧，大致可分為四類解釋。

冷少川、布恩 (A. Boone) 等經濟史學家提出的經濟學解釋，強調各種長短期經濟因素的互動對這一出口起伏的影響。他們普遍認為，1958 年中國對東南亞出口大增，乃是中國與東南亞貿易自 1950 年代中期以來持續增長的結果，主要驅動因素是中國經濟恢復與發展後出口能力不斷增強、需加強出口創匯來進口所需經濟資源等長期經濟因素。例如冷少川認為，1950 年代中後期中國加強對東南亞進出口貿易，有下列經濟和政治考量：中國的工業化需要從東南亞獲得重要經濟物資，如天然橡膠、石油、有色金屬等；擴大出口以獲得更多外匯來保證重要進口；宣傳自身工業進步並由此加強國家聲望等。而 1959 年初這一出口任務開始停滯甚至下降，則與當時中國爆發經濟危機以及償還蘇聯和東歐國家巨額債務兩大短期經濟因素有關^⑤。

魏爾辛斯基 (J. Wilczynski) 和克萊因 (Sidney Klein) 則提出了強調政治外交因素影響的「經濟冷戰」解釋。他們指出 1958 年社會主義陣營有一系列經濟冷戰舉動，如中日爆發嚴重貿易衝突、蘇聯大量拋售錫和鋁而引發國際市場極大震盪等。1958 年中國之所以對東南亞出口猛增，其實質是中國政府為配合盟友從經濟上打擊西方國家，而故意針對東南亞這個西方工業品主要市場和重要經濟原料產地進行的一次惡意商品傾銷^⑥。但這兩位學者均迴避了一個重要問題：如果中國政府意在擾亂西方市場，為何在東南亞採取歧視性進口政策後反應溫和？

黃朝翰為調和上述兩種解釋，提出了中國與東南亞雙邊經濟與政治因素之間互動的政治經濟學解釋。他贊同各種長期經濟因素推動了 1958 年中國對東南亞國家出口大增，但特別指出了這一事實：東南亞諸國只對中國商品採取歧視性進口政策，並未對在當地市場佔據主導地位的日本、英國商品採取類似限制。黃朝翰認為，這是因為中國與東南亞諸國存在政治意識形態差異和矛盾 (如經濟制度差異、意識形態不同、馬來亞共產黨問題、華人問題等)，導致東南亞誤以為中國進行惡意傾銷而採取進口歧視行動，並引發了雙方貿易摩擦。但他強調，由於中、馬、新三方均對雙邊貿易的互利效果有務實認識，所以在摩擦中態度克制，令相關貿易雖出現倒退但未斷絕^⑦。

以上三種解釋的最大分歧在於，1958 年中國對東南亞出口大增是否中國故意採取相關政策的結果？囿於當時可用中國史料有限，三種解釋均無法闡明中國對東南亞出口的具體政策究竟如何這一關鍵問題。就此而言，可稱為「大躍進事件史」的第四類解釋頗有啟示意義。1980 年代末以來，趙德馨、徐德志、凱利 (Jason M. Kelly) 等學者的相關研究說明，大躍進這一重大當代史事件導致 1958 年中國對外貿易政策從謹慎轉向激進方針，加之期間進行了宏觀經濟管理權限下放，令當時中國對外出口出現極大的擴張和混亂；1958 年底中共領導人對大躍進進行降溫後，中國外貿又一度走向緊縮。但遺憾的是，這些學者未能探討大躍進時期中國對東南亞出口的具體政策^⑧。

鑒於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基於現已較為豐富的中文公開文獻和在中國與東南亞貿易中起主要作用的廣東省相關解密檔案，結合其他國家史料文獻，着

重探討 1958 年中國對東南亞出口躍進政策的內容及其演變，檢視導致其變化的原因、影響，並提出一種三層次的系統性解釋^⑨。

一 冷戰變化與出口躍進的開始：1957 年底至 1958 年 6 月

就筆者所見，隨着大躍進運動的興起，負責中國對外貿易工作的對外貿易部（以下簡稱「外貿部」）的確同步提出了 1958 年加強對東南亞出口的政策。當時中國政府相關文件從政治角度出發，將外貿對象國家和地區分為三類：一為蘇東社會主義國家；二為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採取中立主義的民族主義國家（如印度、斯里蘭卡，大多是新獨立的亞非拉國家）；三為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不僅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英國、日本、法國等），也包括當時仍處於西方殖民統治下或在政治上追隨美國的國家和地區（如新加坡、馬來亞，以及戰後仍處於英國、葡萄牙殖民統治下，現已回歸中國的香港、澳門地區）。在一些文件中有時也出現將民族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合稱為「非社會主義國家和地區」的情況^⑩。

1957 年 12 月初中央領導人提出了中國要趕超英國後，外貿部部長葉季壯在 12 月 17 日全國外貿局長會議上就首次提出，由於「東風壓倒西風」和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經濟衰退，中國有必要從鞏固與發展對民族主義國家貿易、分化資本主義國家、趁機購進中國急需的工業設備和技術三大目的出發，適當增加對非社會主義國家和地區的貿易。葉季壯特別強調應加強對東南亞的出口，要在華人較多、中國內地商品較受歡迎的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亞、加拿大等地「好好地搞出些成績來」，具體目標是在外貿領域「佔領港澳，將新馬變成第二個港澳」^⑪。

1958 年 1 月 11 至 22 日的南寧會議明確提出當年工農業生產要實現大躍進後，外貿部立刻提高了對東南亞等資本主義市場出口的指標。2 月 3 日，外貿部下發了題為〈鼓起革命幹勁為完成一九五八年對資本主義國家出口六億到七億美元的光榮任務而努力〉的文件，提出為緊跟大躍進新形勢，中國對資本主義市場貿易（以下簡稱「對資貿易」）要實施新的「大進大出」激進政策，更將原定 1958 年對資本主義市場出口（以下簡稱「對資出口」）任務從 6 億美元浮動到 6 至 7 億美元，其中 2.4633 億美元（以 6 億美元計算佔 41%）為對港澳及新馬出口（包括轉口貿易）^⑫。在中國與東南亞貿易中佔有較大比重的廣東省^⑬，其對外貿易局也不斷提高對資出口指標：1957 年 10 月初步安排的 1958 年對資出口總額為 1.14845 億美元，比 1957 年計劃完成 1.04827 億美元增長 9.5%^⑭；到 1958 年 2 月 25 日提高至 1.641 億美元，比 1957 年實際完成情況增加 36.84%^⑮。至此，1958 年中國對東南亞的出口躍進政策開始。

值得強調的是，外貿部決定要加大對東南亞出口，不僅是受到大躍進的影響，也與經濟冷戰的變化有關。此時，中國與東西方國家的貿易關係正處於微妙但又重要的變動之中。1956 至 1957 年中國經濟因為「冒進」與「反冒進」運動而起伏較大，中國對蘇東國家的設備、技術和工業品進口訂貨也出現了先驟然擴張後大幅緊縮，甚至是突然撤銷訂貨的情況。這種做法令執行嚴格

計劃經濟的蘇東國家損失嚴重。中國在1958年初向蘇東國家提出大量訂貨需求後，後者擔心中國重蹈覆轍而態度消極^⑩。北京意識到大躍進已難獲得兄弟國家充分的經濟支持，急需另闢蹊徑以獲得外部經濟資源^⑪。這解釋了為何從1957年底開始，葉季壯和外貿部其他領導人即不斷強調，中國應抓住西方正值經濟衰退而急於擴大對華出口的機會，從西方發達國家進口中國工業化所急需的設備、技術和原料^⑫。不過，要能及時從西方進口大量設備、技術和原料，外貿部門又不得不完成足夠大的出口任務以獲得足量西方外匯，為此中國商品佔有相當優勢的東南亞市場自然被外貿部寄予厚望。

非常矛盾的是，外貿部雖認識到對東南亞等資本主義市場出口任務的完成是大躍進成功的重要前提，但對這一出口任務的政治定位極低。外貿部諸多領導人講話和文件均反覆強調，就政治意義而言，中國對資出口重要性不僅低於中國與兄弟國家、民族主義國家這兩類貿易，甚至在對資貿易中也從屬於進口^⑬。這一經濟與政治定位之間的矛盾，隨着中外局勢發展而日漸尖銳，並導致此後中國對東南亞出口政策與實踐起伏極大。

要實現對東南亞出口躍進，外貿部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是國內貨源不足問題。由於1956年下半年開始，原來旨在平衡國內外經濟需求的「內銷服從外銷」（國內銷售服從國外出口）原則出現鬆動^⑭，在負責國內貿易的商業部競爭下，外貿系統已不能掌握足夠、穩定、符合西方國際市場需求的貨源。以廣東省食品和果菜出口系統為例，因高級乾魷魚、墨魚、章魚、柿餅等優勢出口商品被商業部用於優先供應國內市場，可供出口數量大大減少，相關出口在1957年出現停滯或萎縮，在1958年頭兩個月更未能完成出口任務^⑮。為此廣東省進行了下列政策探索：

首先，1958年2月廣東省政府和廣東省外貿局多次發文強調，全省上下應保證出口貨源的供應，如貨源不足就應擠壓國內消費以滿足出口需求，這實際上是重新確立了「內銷服從外銷」原則^⑯。其次，廣東省外貿局積極到湖南、江西、四川、雲南、貴州等外省市尋找各種出口貨源^⑰。再次，1957年廣東省外貿局經廣東省政府批准，在塘魚、瓜菜等出口商品生產方面試行了「劃區生產供應出口」，按照國際市場要求，劃定特定生產地區或部門來專門從事相關出口商品生產；發現該辦法既保證了外貿部門可直接從劃定產區獲得符合各種出口要求的貨源，又大大減少中間環節、節省時間並緩解了內外銷矛盾^⑱。廣東省外貿局將成功試行的「劃區生產供應出口」辦法，於1958年初擴大至蒜頭、香蕉、鮮蔬菜、水產品、生豬、家禽、蛋品、皮革製品、手電筒、絲綢、松香等諸多出口商品，相關生產基地也隨之擴散至全省諸多市縣地區^⑲。廣東省的做法隨即獲得外貿部的支持，「內銷服從外銷」、「跨省組織貨源」和「劃區生產供應」被正式列入其3月發布的〈對外貿易工作二十四條〉這一指導文件中^⑳。

外貿部門面臨的另一大挑戰來自外部。正處於嚴重經濟蕭條之中的西方發達國家此時不僅設法減少從中國進口，更努力擴大對東南亞出口以緩解自身危機，這意味着中國要與其展開激烈的市場競爭。在1957年12月全國外貿局長會議上，葉季壯提出以「大進大出」和「競爭價格」兩個政策應對：前者指中國外貿部門應積極利用當前資本主義國家希望增加對華出口的心理，採取

進出口掛鈎的辦法，設法令外國商人在對中國大量出口的同時，也不得不大量從中國進口；後者指通過適當壓低出口商品價格，加強出口商品質量，迎合海外市場的規格、花色需求等辦法，積極擴展中國商品在東南亞市場的份額。不過，葉季壯也注意到競爭價格可能會產生負面作用，特意強調要考慮「在競銷中會不會引起反感或反作用」的問題^②。除上述兩點外，外貿系統還全面加強了海外推銷力度。各專業外貿公司和地方外貿部門紛紛增設駐外商務機構或派出推銷小組，並採取措施動員海外華商積極銷售中國商品^③。例如，為鼓勵港澳和新馬華商積極從事中國食品的轉口貿易工作，廣東省食品公司將其佣金提高至4%^④；中國銀行向銷售中國商品的華商提供優厚貸款或擔保^⑤。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葉季壯所提的「價格競爭」，絕非如前述論者所認為是不計成本的惡意傾銷，因為中國政府對資出口躍進的目的，是在中國自身經濟資源緊缺情況下，用適量物資出口來盡可能換回足夠多的外匯，為此葉季壯專門提醒「不能亂跌價，同時要防止壟斷資本集團故意跌價套購我們的貨物」^⑥。考慮到1957年廣東省甚至是中國各口岸之間均曾出現壓價競爭，令全國對資出口出現商品數量增加但外匯收入不變甚至是減少的情況^⑦，外貿部和廣東省外貿局在1957年底、1958年初多次強調，為保證足夠外匯收入、避免內部惡性競爭，口岸之間、口岸與總公司之間、國內機構與國外機構之間需遵循「統一對外」的出口宏觀管理原則，加強配合聯繫以求步調一致^⑧。

為此外貿部和廣東省積極推行「集中貿易」辦法，即將出口數量大、外銷地區較為集中的商品主要由一個口岸掌握價格並對外進行統一成交，以保證出口價格有足夠盈利空間從而避免各口岸互相壓價。這一辦法在中國土產出口公司針對不同出口土產品而制定的四類出口策略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第一類商品產地集中、出口數量大、外銷地區也較集中，採取由一個口岸掌握價格及對外進行統一成交。第二類商品產量較大、產地較分散、品質規格包裝較複雜、銷售地區也較分散，各口岸均有一定經營能力，為防止多頭競銷，這類商品由一個口岸主管經營，其他口岸配合經營。第三類商品產量、規模較小，由各口岸自行掌握。第四類是新發掘商品，首先試銷成功的口岸在二年內擁有專營權^⑨。例如，糖子、釐竹、臘味等由廣東省口岸實行單一出口，黃樟油、藿香油、桂油、紅磚等則由廣東省口岸統一出口、其他省份口岸進行配合^⑩。另外，廣東省也在本省各口岸進行分工，例如雞蛋由汕頭、汕尾、深圳、石岐、江門、湛江、海口、穗新負責新加坡出口，石岐、江門、穗新、深圳負責澳門出口，汕頭、汕尾、湛江、海口、北海負責香港出口^⑪。為鼓勵承銷中國商品的海外華商積極推銷並避免彼此競爭，外貿部門甚至還組織各類華商有序銷售中國商品^⑫。

不過，外貿系統力圖保持對資出口有序推進的努力很快失效。在1958年4月11至21日華南八省外貿局長會議上，外貿部也仿效其他部門和地方，提出了自己加碼的對資貿易「三本賬」（中央必成、中央期成、部門或地方期成）；「三本賬」中的對資出口指標，分別為6億、6.74億和7.5億美元，對資進口指標則為6.12億、6.5億和7.5億美元^⑬。4月，在各省土產出口公司經理聯席會議上，外貿部副部長李哲人又要求各口岸和各地外貿局展開出口指標競賽^⑭。5到6月，外貿部又改革了外貿管理職能，將各省出口商品的計劃、生

產組織、收購、加工、包裝、倉儲、運輸等管理職能均下放地方，外貿部僅保留統一安排全國進出口計劃的權力，國家經濟委員會僅負責統一平衡全國外匯收支^④。

在這些激進政策和職能改革推動下，各口岸盲目出口、惡性競爭、彼此壓價等現象迅速出現。廣東省各出口部門多次抱怨，由於中國各口岸盲目擴大出口土紙、涼果、雜鹹、西瓜、腐乳等，導致這些商品在港澳和東南亞市場上出現嚴重的滯銷積壓或被拒收現象，最終不得不壓價銷售^⑤。一些出口部門或機構只追求出口而不仔細審查客戶具體資質信譽，導致很多外匯貨款被拖欠甚至是被賴帳。8月，外貿部在一份文件中列舉了較為嚴重的兩例：上海紡織品公司因事先缺乏審查貿易對象資信，導致對英國公司Broome & Wellington寄售棉布60餘萬英鎊和對新加坡四海沅公司寄售棉布200餘萬馬幣的兩筆交易遲遲不能收回貨款；中國食品公司對香港安達公司交易不慎，導致10多萬港元貨款未能收回^⑥。在政治上更為危險的是，為完成本部門或本口岸出口指標，不僅許多外貿部門和機構未經批准就私自直接聯繫外國商人，廣東一些地方甚至還出現了走私現象。如廣東省台山縣上下川、沙堤、廣海等地，在6月中旬到7月間經海關查獲的私運出口物資達十批之多^⑦。

二 政治優先與出口躍進的調整：1958年6月至年底

在1958年6月25日到8月15日外貿部召開的全國外貿局長會議上，周恩來、葉季壯、李哲人等先後到場，突然嚴厲批評了對資出口工作。這些中央領導人不僅批評了各地「各自為政」、低價競銷、直接與資本主義國家商人往來等各種具體問題，更強調對資貿易「一定要對我國政治和經濟上都有利才做，因為對資貿易實際上是一個階級鬥爭」，並特別指出當前對資出口應加強對日本、英國、美國等鬥爭：「要盡量打入各個市場，鬥垮日本貨，孤立美國，排擠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商品，一定要在和平競賽中賽垮帝國主義」，「對英貿易應當冷淡一下，採取冷而不斷的做法」^⑧。

中央領導人突然強調對資出口的政治定位和鬥爭色彩，相信與5、6月中中國國旗在日本長崎受辱、在香港被港英殖民當局禁止懸掛等事件而導致中日、中英關係惡化有關；為此，中國在5月幾乎完全停止對日貿易^⑨。不過，8月2日外貿部黨組向中共中央提交的調整外貿政策草案文件披露，這一變化也與此時對資出口嚴重衝擊了中國對社會主義國家出口有關。外貿部承認，各地均出現了「只重視對資出口而忽視對兄弟國家交貨」的情況，導致中國對蘇東國家出口遠未能完成既定任務。該文件建議，為減少各地惡性競爭現象並保證主要進出口任務的完成，後續外貿工作要根據「統一對外」方針，將對外貿易權力大幅上收至外貿部^⑩。外貿部的政策調整建議獲得中共中央肯定，29日中共中央連續下發了〈關於對外貿易必須統一對外的決定〉和〈關於貿易外匯體制的決定（草案）〉兩份文件，進一步細化了對資貿易「統一對外」的各種政策細則。相關具體政策有：壟斷性強或大宗的進出口商品，均由外貿部所屬總公司統一對外成交；對資本主義市場進出口同類商品的成交價格

必須統一；除外貿部所屬各總公司和各口岸對外貿易機構外，任何地方、任何機構不許做進出口買賣；凡已劃給一個公司經營的商品，其他公司不能再插手；貿易外匯使用也必須先中央、後地方，先重點、後一般，先出口、後用匯等^④。各專業出口公司從7月開始也陸續收回原先下放給地方政府或部門的出口權力，如9月底中國食品出口公司決定由國家統一安排大宗商品的對外貿易，在對資貿易的價格鬥爭上步調一致，由總公司實行對外統一成交，並委託廣州特派員和五豐行統一掌握出口數量和價格^⑤。自此，從5月開始的外貿系統管理權力下放的趨勢逐漸逆轉。

「統一對外」外貿方針的重新確立，並不意味着中國要減少對東南亞的出口。一方面，為與日本競爭，中國加大了對東南亞的出口力度。外貿部門不僅設法鼓勵東南亞華人多銷售中國商品，並利用在廣州舉行的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以下簡稱「廣交會」）與日本商展展開競爭。例如總部位於香港的中央企業華潤公司，利用廣交會與日本商展幾乎同時舉行，以及東南亞商人赴日參加商展一般需經香港中轉這兩個有利條件，積極接觸赴日的新、馬、泰華商，成功勸說了許多東南亞華商直接參加廣交會，或者在參加完日本商展後再參加廣交會^⑥。另一方面，8月2日外貿部呈報中共中央，此時全國上半年對資出口任務仍有3,400萬美元沒有完成，這導致進口所需外匯十分緊張。該文件要求「第三季度必須完成三億美元出口任務」，並特別提出要「積極排擠帝國主義國家的商品，大力打進東南亞市場、非洲和中東市場」等^⑦。

然而，東南亞各國很快限制中國商品的進口。馬來亞政府以保護本國棉紡織工業為理由，從10月1日開始要求所有進口商在輸入中國棉織品時必須領取特別許可證，並明令禁止進口四種中國棉織品。10月底，馬來亞更着手修訂《1958年銀行法》，意在關閉中國銀行在華人華商聚居的吉隆坡、檳榔嶼兩處支行。在馬來亞壓力下，新加坡也採取了類似的歧視性政策^⑧。在泰國，1958年10月通過政變上台的親西方的沙立（Sarit Thanarat）政府，從1959年1月17日起也禁止諸多中國商品在泰國銷售^⑨。儘管外地商品的大量低價湧入確實對東南亞當地同類商品生產形成擠壓，並引發當地生產者不滿，但東南亞各國只限制了中國商品進口，未對在當地市場佔據主導地位的英國、日本商品採取類似行動^⑩。

東南亞各國的反應與此時全球經濟冷戰激化並擴散至第三世界市場這一重要國際因素有關。自1954年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加強了與不發達國家的經濟聯繫後，美國等西方國家即認為這是中國與蘇聯發動的一場「中蘇經濟攻勢」（Sino-Soviet Economic Offensive），旨在利用經濟手段拉攏第三世界國家，以削弱西方陣營。1957年底，蘇聯領導人提出東西方陣營要展開經濟競賽後，隨即大量拋售錫、鋁等原料，對世界原料市場造成很大干擾。為此西方更擔心社會主義國家有可能在第三世界發動一場針對西方的「經濟戰」，即通過低價拋售商品來擾亂世界市場，以便製造西方經濟危機^⑪。

在此背景下，如本文開首所述，西方普遍認為中國加大對東南亞出口，其實質是通過惡意傾銷來控制當地市場、打壓西方商品的一場「貿易攻勢」。中國的競爭對手日本政府高度關注此事，從1958年6月開始就不斷宣傳中國正在向東南亞傾銷商品，不僅對日本商品構成競爭，更對當地工業形成嚴重

威脅。日本政府除採取措施加強對華商品競爭外，更不斷游說美國等西方國家採取聯合行動^⑤。日本通產省官員岡武楠公開強調，西方各國如不針對中國的「貿易攻勢」進行有效反制，「整個東南亞都會被驅入紅色中國的勢力範圍」^⑥。在東南亞有極大經濟利益的英國也有類似舉動。英國政府從1958年2月開始即採取各種措施設法控制中國內地商品進入香港。7月，英國政府更指令其駐東南亞各機構全面評估中國「貿易攻勢」的威脅，並積極協調港英政府、新加坡、馬來亞、泰國等的反制措施^⑦。而美國在此問題上更公開表態支持東南亞各國，並挑撥存在一定商品競爭的中印關係。中國外貿部門觀察到，在新馬限制中國商品進口後，10月21日在日內瓦舉行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第十三次締約國大會上，美國負責經濟事務的副國務卿狄龍(C. Douglas Dillon)特別強調，中國正在東南亞這個印度和日本紡織品的傳統出口市場上傾銷紡織品，印度和日本紡織業因此遭到巨大威脅^⑧。

但相比中國在5月幾乎完全停止對日貿易的做法^⑨，中國對東南亞諸國的反應頗為溫和。新馬限制中國商品進口後，中國政府並未出面，僅由中國貿易促進會致信新馬多家商號，譴責新加坡和馬來亞政府對中國採取不友好態度。中國的反制行動也十分克制，僅有同年11月暫停向新馬輸出某些貨物、對新馬出口只以現匯方式成交並只接受英鎊或港幣、減少從馬來亞直接進口天然橡膠、停止對新馬商人發放外貿信貸等溫和舉措，並未停止經過港澳對馬來亞半島的轉口貿易^⑩。據黃朝翰統計，中國對馬出口中僅有大約15%受到上述限制^⑪，而1958年秋季廣交會的成交合同中對新馬成交合同額依然高達1,843萬美元，儘管其中轉口或代理合同成交額佔45.42% (837萬美元)^⑫。

中國政府的克制立場，與此時中國對資出口任務完成進度不佳的現實有關。1958年9月底、10月初，廣東省外貿局發現對港澳和東南亞的土紙、臘味、水海產品、糧食、松香、松節油、椰絲、罐頭、錫、石棉、茶葉、涼果等諸多商品出口任務完成進度很差。據各部門反映，造成這一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大煉鋼鐵」等國內躍進運動佔用了大量勞動力、原料、設備和運輸工具，導致貨源不足和質量低劣、運力缺乏、運輸錯誤、包裝材料欠缺等問題，外商退貨或索賠糾紛等現象普遍出現。以廣東口岸為主，湖南、福建、廣西口岸為輔的對港澳、新馬土紙出口到9月左右僅完成年度計劃的41%；水海產品出口計劃到9月底僅完成了總計劃額2,155萬美元的58.26% (1,255萬美元)；糧食出口貨源不足導致廣東省不得不擠壓省內消費和來年種子以供應出口^⑬。

這一情況在全國層面更為嚴重。10月10日，葉季壯致信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強調由於貨源、運輸及包裝三方面均存在嚴重問題，1958年中國極有可能出現大批對資出口以及對社會主義國家出口合同未能完成的情況，不僅會對中國國際商譽造成極大損害，並會在中國全年進口任務已經基本完成的情況下造成嚴重的進出口不平衡問題。葉季壯請求由李先念出面，動員各地相關部門對出口合同的完成予以緊急支持。這一情況引起了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11月8日，總理周恩來、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李先念等親自檢查了相關外貿工作和對外合同履行情況^⑭。根據中央的指示，廣東省對東南亞出口力度不減，不僅通過進一步擠壓國內消費、深挖庫存、組織貨源搶裝、利用各方資源組織運輸力量等辦法加強交貨^⑮，更專門開闢南海縣九江、番

禺縣市橋為新的出口物資裝運地點和出口口岸，以便加快物資出口^⑥。經過各地部門的努力，到1958年末全國及廣東省對東南亞的出口任務基本完成^⑦。

三 爭取印度與對出口躍進的緊縮：1959年初

從1959年初開始，中國對東南亞出口躍進勢頭突然消退並於年中結束，這一變化主要是年初中央政府對外貿大躍進的基本立場發生重大調整的結果。廣東省外貿局曾在1958年12月16日提出，1959年要繼續進行對資出口躍進、實現對資出口任務達到1.9億美元，比1958年1.641億美元指標還要增加2,500萬美元^⑧。但在23日接見外貿部、各口岸外貿局長座談會上，周恩來專門提出，「對外貿易應量力而行，逐步發展，不能大進大出、大躍進」^⑨。隨後中共中央和外貿部都正式否定了此前的「大進大出」外貿激進方針，轉而提出了更為謹慎的「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外貿方針和「以國內市場為主、國外市場為輔」的經濟物資分配新方針^⑩。1959年中國外貿計劃指標和對東南亞出口指標都進行了極大的壓縮^⑪。

此時，中央領導人決定停止對東南亞出口躍進，並不僅因為中國已出現經濟困難、毛澤東開始對大躍進進行降溫等經濟因素影響^⑫，也與北京認為對東南亞出口躍進有不良政治後果這一判定有關。1958年底、1959年初，北京發現不僅廣東省向港澳和東南亞市場以低價形式擴大棉紗、棉布、煤炭、葵骨、掛瓦等的出口，均與印度商品構成激烈競爭^⑬，上海更因盲目低價出口低級原棉，搶佔了印度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份額，從而引發印度的極大不滿。由於此時中國正在國際冷戰鬥爭中極力爭取持中立態度的民族主義國家印度，周恩來曾專門過問中印商品競爭問題，並對外貿部和有關地方提出嚴厲批評。中共中央隨後專門批示：「對外貿易計劃完成得不好，不僅給兄弟國家和友好國家帶來了一些困難，給帝國主義和反動派以造謠污蔑的藉口，同時還嚴重地影響到國家的外匯收入和國家經濟建設的物資供應，而且還被迫地退出我傳統市場，這都是不利的，必須立即設法改變這種局面。」^⑭外貿部在1958年11月和1959年3月兩份文件中先後明確提出，中國對東南亞等資本主義市場的出口要避免與印度商品競爭，甚至強調凡是與印度棉紡織品構成競爭的棉紡織品，中國都應盡量少出^⑮。在此影響下，中國土畜產進出口總司廣東省分公司在制訂1959年對東南亞出口計劃時，就明確提出了要降低或控制有關商品在東南亞的銷售，以緩和與印度、港澳等商人企業的競爭。例如，在與印度展開激烈競爭的香港葵骨及葵骨掃把領域，該公司強調這兩種商品「均屬我國傳統商品，不能退出國外市場，但準備暫時不予獨佔」。在與印度有競爭關係的掛瓦領域，提出「為了減少與民族獨立國家的矛盾，59年為生產條件能適應，擬適當出口部分約100-150萬塊，佔〔市場〕容量10-15%，並在價格上與印度採取配合」^⑯。

在以上各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下，中國對港澳地區和新、馬、泰出口出現了明顯收縮甚至是下降的態勢。1959年中國對資出口總額為6.1億美元，低於1958年完成的7億多美元。1959年廣東省對外出口只有2.3241億美元，比1958年的3.1億美元下降了24.3%。一直密切關注中國出口的日本政府、台灣當局等立刻敏銳發現^⑰。

四 餘論：三重視角的經濟冷戰解釋

上文說明，1958年中國對東南亞出口之所以起伏巨大，的確主要是中國政府相關出口政策變化的結果。從1958年初開始，外貿部就確立了當年要實現對東南亞出口躍進的政策，並採取了各種措施保證這一任務的完成。不過，出於各種因素考慮，到年底中國政府卻主動收緊了對東南亞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市場的出口。中國政府相關政策起落以及所產生的巨大國際影響的因素紛繁複雜，現有解釋難以進行涵蓋甚至有錯誤解讀，筆者以為需要一種綜合全球冷戰史、中國政府「經濟治國方略」(economic statecrafts)和國內政治過程三層次的系統性視角來加以解釋。

全球冷戰史視角的重要性在於，諸多超出單邊和雙邊因素之外的各種全球冷戰因素，對中國相關政策的演變起到了較為隱蔽但卻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國對東南亞出口躍進的興起，除了與中國自身經濟需求、中國政府希望藉此打擊某些西方國家的政治考量、大躍進激進主義蔓延等單邊因素有關外，更與中國和兄弟國家產生貿易矛盾、西方陣營因經濟蕭條而希望加強對華貿易等全球冷戰因素有關，甚至作為東南亞出口突增主因的大躍進運動，本質上就是中國領導人針對西方陣營展開的一場冷戰經濟競賽。而本文提及1958年東西方爭奪第三世界的經濟冷戰全面趨於激化，正與黃朝翰的分析形成互補，更好地詮釋了中國出口增加為何會引起國際社會如此巨大的反響。最終，1959年初中國政府主動收縮對東南亞出口，除了與東南亞各國強烈反彈、中國自身經濟困難、中蘇經濟矛盾、大躍進激進政策調整等因素有關外，更直接受到中國為在冷戰中爭取印度而極力避免彼此經濟競爭發酵這一國際冷戰考量的影響。

「經濟治國方略」視角強調一國政府主動將對外經濟活動作為工具來實現其多重對外戰略目的^⑧。該視角能更好地從以下兩點解釋中國相關政策的起伏及其特點。首先，它充分展示了中國政府制定政策時的複雜戰略考量及其內在矛盾。外貿部決定對東南亞出口躍進時，實際上有多重戰略考量並力求取得平衡，而並非僅受到單個因素所驅動，但其兩大基本考量——在經濟上盡可能多地出口創匯和在政治上必須服從中國對外政治鬥爭需要——之間存在着矛盾並迅速激化，此種張力導致中央政府出口政策呈現搖擺甚至是大起大伏的局面。其次，它有效展現在中國政府推動下對資出口為何會有如此鮮明的特點和產生極大國際影響，而對黃朝翰有關東南亞國家的意識形態分析構成補充。如前所述，具有強大動員能力的中國政府為保證出口躍進的成功，不僅犧牲國內經濟需求、專門建立對接西方需求的出口生產基地等，甚至通過各種手段來動員海外華商和外國商人。此種強烈的國家主導特色固然令中國出口大增，但令其他與中國經濟制度不同、經濟實力較弱的國家產生深刻疑慮與強烈反彈，並導致北京從一開始力圖避免或未曾意料到的不利後果。

除上述視角外，強調決策和政策形成過程中一國內部各部門、地方之間博弈的國內政治過程視角也不可或缺。本文顯示，這種博弈在中國對東南亞出口躍進中極為複雜，遠非現有的大躍進事件史解釋所強調的經濟管理職能下放導致地方競爭這一點所能涵蓋。早在躍進初始階段，毛澤東時代趕超型經濟的意識形態與中國薄弱的經濟基礎不匹配所產生的經濟資源相對稀缺

這一固有矛盾^⑨，就已導致外貿系統與商業部之間就相關經濟資源與政策安排展開激烈競爭；甚至在外貿系統內部，也存在着出口與進口、對社會主義市場出口與對資出口的競爭。上述競爭如此激烈，以至於屢屢需要中央領導人出面干涉，並導致對東南亞出口政策有極大沉浮。這種競爭的影響也涉及多個領域，有正有負。各地方之間的競爭雖衝擊了中央政府對於中國對東南亞出口躍進的政治定位並產生了複雜的負面外交影響，但也激發了地方政府和專業外貿機構的制度和政策創新能力，先後摸索出「跨省組織貨源」、「劃區生產供應出口」等辦法，並成為此後中國長期堅持的經濟制度和政策，保證了中國商品在西方市場的銷路。地方政府與專業機構表現出的上述制度政策創新能力和對中央政府總體目標的破壞能力，與一些經濟學者有關中國自1950年代形成的「M型組織結構」（分散、自主的多層級、多部門）中，地方政府在經濟生活中具有不可忽視的正負兩面作用的想法，可構成某種呼應^⑩。

通過上述三層次視角的累加，我們發現中國對東南亞出口躍進政策及實踐的戲劇性變化，凸顯了紅色中國在經濟領域的一個根本挑戰：中國究竟應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建立何種關係？當1958年中國希望能高速實現自身工業化時，與社會主義陣營世界體系相比，科技更為先進、資源更為充沛、市場更為廣大、具有一定經濟優勢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無疑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不僅中央政府意識到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可極大助力中國工業化，與東南亞等資本主義市場存在密切聯繫並有相當經濟優勢的廣東省等東南沿海省市更在中央政策放寬時迸發出極大的熱情。但1958年又是中國革命意識形態極為高漲的一年，中央領導人除了希望能通過高速經濟發展證實「東風壓倒西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於資本主義這一戰略判斷，也嘗試利用與資本主義市場的經濟聯繫，或懲戒那些試圖遏制中國政治外交目標的西方國家，或出於穩固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中立國家的關係而壓制某種貿易。1958年中國對東南亞出口所展示的經濟定位與政治定位之間存在的嚴重衝突，暗示着此後中國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關係仍將一波三折^⑪。

註釋

① “Success of Russian Tin Dumping Laid to Supplies from Red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23 September 1958, 45; “Too Much Too Soon”, *Time* 73, no. 7 (1959): 34-36; “Strategy for the War”, *Time* 73, no. 11 (1959): 92-94.

② “China’s Trade in Septemb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5, no. 15 (1958): 476; “Malaya to Stop Dumping of Red Chinese Textile”, *Hongkong Tiger Standard*, 2 November 1958.

③⑦⑧⑨ John Wo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84), 72-74, 162; 79-88; 79-88; 72-74.

④ 中國官方出版物在論述1950年代末中國與馬來亞、新加坡、泰國關係惡化時，雖簡略提及新、馬、泰對中國的貿易限制措施，但未提及這些措施的出台與1958年中國對東南亞大量低價出口商品有關；主要強調東南亞國家支持美國干涉印度支那並採取反共、反華立場等政治外交因素。參見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68。沈覺人在論述1950年代中國與新加坡、泰國外貿關係時甚至未提及此次貿易摩擦。參見沈覺人主編：《當代中國對外貿易》，上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頁64-65、334-39。

⑤ 參見 Shao Chuan Leng, "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Far Eastern Survey* 28, no. 1 (1959): 1-11; A. Boone,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 (July-September 1962): 171。類似角度的分析，參見 Pauline Lewin, *The Foreign Trade of Communist China: Its Impact on the Free World* (New York: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for Frederick A. Praeger, 1964), 64; Feng-hwa Mah, *The Foreign Trade of Mainland China* (Chicago: Aldine · Atherton, 1971), 17; Alexander Eckstein, *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Trade: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y McGraw-Hill, 1966), 188。也有論者認為，中國外貿有服務國內經濟發展和策應中國外交的雙重功能，但未專門探究 1958 年中國對東南亞出口問題。參見 Alexander Eckstein, *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Trade*, 183-84。

⑥ J. Wilczynski, "Dumping and Central Plann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4, no. 3 (1966): 250-64; Sidney Klein, *Politics Versus Economics: The Foreign Trade and Aid Policies of China*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Group, 1968), 118。

⑦ 趙德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66》（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 702-706；徐德志等編著：《廣東對外經濟貿易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頁 210-17。近年來，海外唯有美國學者凱利基於河北、江蘇等地方檔案，對於外貿部對資本主義市場貿易政策變化有較為詳細的描述，但他未能利用當時在中國對資本主義國家貿易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廣東省、上海和天津等口岸省市解密檔案，因此在研究內容和角度上有所疏漏。參見 Jason M. Kelly, *Market Maoists: The Communist Origins of China's Capitalist Asc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126-56。

⑧ 除廣東省館藏檔案外，天津、上海等中國外貿口岸城市涉及對東南亞出口的檔案文獻目前較難獲得。最有價值的史料集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58-1965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

⑨ 例如〈對外貿易工作二十四條〉（1958 年 3 月 3 日），載《1958-1965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頁 6-7。

⑩⑪ 〈葉部長在外貿局長會議上的總結講話（記錄稿）〔節錄〕〉（1957 年 12 月 17 日），載《1958-1965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頁 3-4；4。

⑫ 〈全國外貿局長會議參考文件之四：鼓起革命幹勁為完成一九五八年對資本主義國家出口六億到七億美元的光榮任務而努力〉（1958 年 2 月 3 日），載《1958-1965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頁 397-403；廣東省外貿局：〈貫徹對資出口會議的初步意見〉（1958 年 2 月 24 日），廣東省檔案館（以下簡稱「廣檔」），324-2-17，頁 1-14。有關「大進大出」方針確立的背景，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66》，頁 702-704；林海雲傳記組編：《林海雲傳——從紅軍戰士到共和國海關總署署長、外貿部部長》（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0），頁 351。

⑬ 1957 年廣東省對港澳、馬來亞（含新加坡）、泰國的出口額為 0.94821 億美元，如再加上斯里蘭卡、印尼、緬甸、菲律賓，出口額則為 1.05769 億美元。同年中國對港、澳、新、馬、泰出口額為 2.0802 億美元，加上斯里蘭卡、印尼、緬甸、菲律賓，出口額則為 2.6539 億美元。可見廣東省的相關出口佔全國出口約 50%。參見廣東省計劃委員會：《廣東省八年來貿易統計資料彙編：1950-1957》（內部資料，1958），頁 67；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經濟貿易部：《對外貿易統計資料彙編（1950-1989）》（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經濟貿易部，1990），頁 47-56。

⑭ 廣東省對外貿易局：〈1958 年廣東省對外貿易幾項主要工作〉（1957 年 10 月 6 日），廣檔，302-1-93，頁 43-45。

⑮ 廣東省對外貿易局：〈1958 年廣東對外貿易工作大躍進的計劃〉（1958 年 2 月 25 日），廣檔，235-1-209，頁 36-50。

⑯ 關於蘇聯與東歐國家對中國訂貨起伏極大的各種抱怨，參見〈對外貿易部副部長李強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稿：建設大躍進與兄弟國家對我國的技術援助問題〉（1958 年 5 月），載《1958-1965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

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頁291-93。有關當時中國與東歐國家之間貿易矛盾的研究，參見Aleš Skřivan, Jr., "On the Expansion of the Czechoslovak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hina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The Historian* 74, no. 4 (2012): 725-42；陳弢：〈一九六一年中德蘇關係變化背景下的馬特恩訪華〉，《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4期，頁62-71；葛君：〈從合作到鬥爭：1956-1964年中國與民主德國的貿易關係〉，《史林》，2020年第2期，頁171-81。

⑰ 〈對外貿易部黨組關於今後對外貿易發展趨勢、任務、方針政策和重要措施給中央的報告〉（1958年5月11日），載《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頁11-18。

⑱ 〈葉部長在外貿局長會議上的總結講話〉、〈對外貿易部關於一九五八年對外貿易計劃的請示報告〉（1958年3月13日），載《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頁3-4、77-79；廣東省外貿局：〈貫徹對資出口會議的初步意見〉，頁1-14。當時西方學者就已經意識到中國大躍進對進口技術、設備的巨大需求與蘇聯的出口能力存在較大差距，中國有可能會利用西方放鬆對華戰略禁運的機會而積極進口西方設備。參見N. B. Scott, "Sino-Soviet Trade", *Soviet Studies* 10, no. 2 (1958): 161。

⑲ 〈葉部長在外貿局長會議上的總結講話〉、〈全國外貿局長會議參考文件之四〉，頁3-5、397-403。

⑳ 有關這一變化的介紹，參見李光和：〈試論新中國外貿史上的內銷服從外銷方針〉，《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1期，頁70-81。

㉑ 廣東省高級海鮮出口從1956年的687噸驟降至1957年的355.8噸。參見廣東省食品進出口公司：〈1958年水海產品出口方案(草)〉（1958年1月24日），廣檔，325-1-448，頁14-24。廣東省對東南亞果菜出口也出現類似情況。參見廣東果菜出口公司汕頭公司：〈汕頭口岸1957年11月跨1958年1月柿餅出口工作小結及今後經營意見〉（1958年2月6日），廣檔，325-1-446，頁29-35。廣東省外貿部門在1958年1月僅完成第一季度出口任務的24%，其中果菜類僅完成19%，水海產品甚至發生了因為貨源不足而導致出口計劃落空或出口數值縮減的現象。參見廣東省人民委員會：〈關於大力供應貨源擴大出口的指示〉（1958年2月9日），廣檔，235-1-227，頁15。

㉒ 廣東省人民委員會：〈關於大力供應貨源擴大出口的指示〉，頁15；廣東省對外貿易局：〈1958年廣東對外貿易工作大躍進的計劃〉，頁36-50；廣東省委宣傳部：〈轉發江門土產出口公司採用整風方法學習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經驗報告〉（1958年6月9日），廣檔，214-1-23，頁37-42。

㉓ 廣東省外貿局：〈貫徹對資出口會議的初步意見〉，頁1-14。

㉔ 參見廣東省對外貿易局：〈1958年廣東省對外貿易幾項主要工作〉，頁43-45；〈關於湛江售價較高、雷州生豬多供出口問題〉（1957年11月2日），廣檔，325-1-456，頁21。

㉕ 以廣東省出口土產產品的相關生產分工為例，汕頭、高要、韶關、湛江、合浦等地區專門負責松香出口商品生產，開平負責蒜頭，東莞負責香蕉，惠陽、佛山負責鮮蔬菜，南海水產公司負責出口水產品，部分國營農場負責生豬等。參見中國土產出口公司廣州分公司：〈1958年對港、澳、東南亞及資本主義國家出口計劃(草案)〉（1958年1月18日），廣檔，324-1-67，頁28-46；廣東省服務廳：〈農場生豬直接交外貿出口〉（1958年2月12日），廣檔，297-1-16，頁46-47；廣東省對外貿易局：〈1958年廣東省對外貿易工作大躍進的初步意見(草稿)〉（1958年2月27日），廣檔，235-1-209，頁36-50；廣東省服務廳：〈關於劃分三鳥、蛋品的出口採購供應〉（1958年3月15日），廣檔，297-1-16，頁48；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廣東省人民委員會通知水產品外銷直接與出口部門掛鉤並安排數量〉（1958年3月27日），廣檔，235-1-227，頁40-41；〈關於劃廠供應出口松香的通知(急件)〉（1958年5月9日），廣檔，262-1-0078，頁113。

㉖ 參見〈對外貿易工作二十四條〉，頁8，第十四、十六條。

㉗ 〈葉部長在外貿局長會議上的總結講話〉、〈雷任民副部長在華南八省外貿局長會議結束時的發言〉（1958年4月21日），載《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頁3-4、27；廣東省外貿局：〈貫徹對資出口會議的

初步意見》，頁1-14。〈雷任民副部長在華南八省外貿局長會議結束時的發言〉印刷版本所寫的時間是1958年9月21日，正確日期應為1958年4月21日。

⑳ 廣東省外貿局：〈貫徹對資出口會議的初步意見〉，頁1-14；廣東省對外貿易局：〈1958年廣東對外貿易工作大躍進的計劃〉，頁36-50；中國土畜產進出口總公司廣東省分公司：〈對資出口躍進指示〉（1958年5月30日），廣檔，324-2-17，頁15-21。

㉑ 廣東省食品進出公司：〈出口罐頭大躍進方案〉（1958年3月8日），廣檔，325-1-451，頁16-24。

㉒㉓ 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關於團結利用港澳華商進一步擴展對港澳及東南亞的貿易問題（附件之二）〉（1958年），廣檔，304-1-20，頁30-34。

㉔ 有關1957年廣州、上海、天津等口岸圍繞對東南亞等資本主義市場的肥皂、蟲蠟花、再製蛋等出口進行激烈壓價競爭的情況，參見〈全國外貿局長會議參考文件之四〉，頁397；中國土產出口公司：〈為覆蟲蠟花仍由廣州口岸單一經營出口由〉（1958年1月13日），廣檔，324-1-63，頁13；中國食品出口公司：〈停止再製蛋輸新馬事〉（1958年1月16日），廣檔，325-1-453，頁1。

㉕ 葉季壯與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在相關講話中對此問題的強調，參見〈葉部長在外貿局長會議上的總結講話〉、〈雷任民副部長在對資出口會議總結大會上的發言（記錄稿）〉（1958年2月15日），載《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頁4、41。廣東省對此問題的指示，參見廣東省外貿局：〈貫徹對資出口會議的初步意見〉，頁1-14。

㉖ 中國土產出口公司：〈中國土產出口公司第五屆全國各分省公司經理聯席會議文件（二）〉（1958年4月8日），廣檔，324-1-59，頁13-28。

㉗ 中國土產出口公司廣州分公司：〈1958年對港澳東南亞及資本主義國家出口計劃（草案）〉（1958年1月18日），廣檔，324-1-67，頁28-46；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部駐廣州特派員：〈關於紅磚58年對港出口安排和兩廣出口比例的幾點決定〉（1958年1月20日），廣檔，324-1-63，頁166；中食出上海分公司：〈覆港澳以外地區我臘味仍配合你司小量出口〉（1958年2月13日），廣檔，325-1-454，頁48。

㉘ 廣東省食品進出公司：〈全省蛋品會議決定事項〉（1958年1月27日），廣檔，325-1-453，頁7-14。

㉙ 〈雷任民副部長在華南八省外貿局長會議結束時的發言〉，頁27。

㉚ 中國土產出口公司：〈中國土產出口公司第五屆全國各分省公司經理聯席會議文件（一）〉（1958年4月），廣檔，324-1-59，頁1-12。

㉛ 5月11日外貿部黨組向中共中央提出，對外貿易業務應本着「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原則進行大規模下放，在獲得批准後，6月17日外貿部明確提出〈關於改進對外貿易體制的方案（草案）〉。參見〈對外貿易部黨組報送關於改進對外貿易體制的方案（草案）〉（1958年6月17日），載《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頁38。

㉜ 廣東省土產出口公司土紙推銷小組：〈報送我小組上半年出口情況小結一份請察核〉（1958年8月5日），廣檔，324-1-63，頁88-91；廣東果菜出口公司汕頭公司：〈1958年汕頭口岸果菜對星馬出口情況及經驗〉（1959年1月19日），廣檔，325-1-460，頁41-43。

㉝ 對外貿易部：〈關於上半年對資出口支付方式存在問題的通報〉（1958年8月16日），廣檔，325-1-492，頁62-63。針對因盲目出口導致收匯不利的問題，外貿部、廣東省外貿局等先後發布一系列文件予以糾正。參見廣東省對外貿易局：〈廣東省對外貿易局轉發外貿部「關於收匯方式的補充規定」〉（1958年10月16日），廣檔，325-1-492，頁8-9。

㉞ 廣東省委員會：〈各海關不許私自派人到港澳採購進口物資〉（1958年7月17日），廣檔，235-1-227，頁30。

㉟ 〈葉季壯部長在全國對外貿易局長會議上的結論〉（1958年7月19日），載《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頁18-21；李征：《盧續章傳》（北京：中國商務出版社，2004），頁29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頁1282-83。

- ④⑤ 有關兩宗事件對中日、中英貿易及雙邊關係發展的負面影響，參見歐陽湘、李光和：〈從廣交會看中國一九五八年停止對日貿易事件〉，《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5期，頁43-50；周紅：〈試論新中國成立初期對英交際工作——以中英國慶招待會為例〉，《當代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5期，頁50-56。
- ④⑥ 〈中共中央批轉對外貿易部黨組關於全國對外貿易局長會議的報告〉（1958年8月），載《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頁21-26。
- ④⑦ 中共中央：〈關於對外貿易必須統一對外的決定〉（1958年8月29日），廣檔，219-2-134，頁173；〈關於貿易外匯體制的決定（草案）〉（1958年8月29日），廣檔，219-2-134，頁174-75。
- ④⑧ 中國食品出口公司：〈中國食品出口公司為通知關於加強統一對資貿易商品上下分工及價格掌握問題的幾項規定〉（1958年9月30日），廣檔，325-1-492，頁1-7。
- ④⑨ 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華潤公司報對星、馬、泰僑商接觸情況及對交易會的建議〉（1958年），廣檔，304-1-19，頁12-13。
- ⑤① John Wo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88-91；吳爾蓓密：〈冷戰時期中國銀行馬來亞經理處被迫停業事件探析〉，《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7期，頁64-79。
- ⑤② 對外貿易部辦公廳編：〈我國同亞非國家貿易情況資料〉（1960年9月），載《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頁535。
- ⑤③ 姚昱：〈走向全球冷戰：艾森豪威爾政府對「中蘇經濟攻勢」的認知與反應〉，《史林》，2022年第2期，頁196-208。
- ⑤④ 對日本相關行動十分關注的台灣當局對此有緊密跟蹤，其情報彙總參見〈中俄匪幫對東南亞地區之經濟攻勢並日本之反響及對策〉，載《中共對東南亞經濟攻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閱覽室，11-01-02-04-02-016，頁111-31。
- ⑤⑤ “Peking Pours Trade into Southeast Asia, by the Associated Press, from *The Christian Science*, July 26, 1958, Singapore: Trade with China, 1957, Jan 01-1959, Dec 31”, FCO141/14957, no. 130, UK National Archives.
- ⑤⑥ 參見英國海外殖民地相關文件，FCO141/14957, UK National Archives。
- ⑤⑦ 〈中國傾銷政策有損亞洲經濟〉（日期不詳），廣檔，304-1-19，頁25-27；“Speech by the Hon. C. Douglas Dillion” (16 October 1958), <https://docs.wto.org/gattdocs/q/GG/GATT/398.PDF>。
- ⑤⑧ 歐陽湘、李光和：〈從廣交會看中國一九五八年停止對日貿易事件〉，頁43-50。
- ⑤⑨ 廣東省對外貿易局：〈關於對新馬進出口的措施〉（1958年11月26日），廣檔，302-1-273，頁146-47。
- ⑤⑩ 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1958年秋交會上有關對星馬地區成交的一些情況〉（1958年），廣檔，304-1-19，頁24。
- ⑤⑪ 中國食品出口公司：〈為轉發部調度進出口船舶幾項規定由〉（1958年9月12日），廣檔，325-1-496，頁19-21；廣東省土產出口公司土紙推銷小組：〈函報土紙出口情況請察核由〉（1958年9月20日），廣檔，324-1-63，頁100-109；廣東省食品進出口公司：〈對港輸出臘味請按旬預算出口數量〉（1958年9月28日），廣檔，325-1-454，頁30-31；廣東省外貿易局運輸辦公室：〈繼續苦戰力爭提前完成出口任務在運輸方面提出幾項措施與要求〉（1958年10月11日），廣檔，325-1-496，頁5-6；廣東省人民委員會：〈轉發中央水產部、外貿部大力抓緊淡水魚旺季全面完成水產品出口任務的指示〉（1958年11月2日），廣檔，235-1-227，頁33-35；廣東省外貿易局：〈廣東省對外貿易任務完成情況和存在問題〉（1958年10月11日），廣檔，222-2-226，頁117-23；廣東果菜出口公司汕頭公司：〈1958年汕頭口岸果菜對星馬出口情況及經驗〉，頁41-43；中國食品出口公司：〈1958年度出口運輸計劃完成情況檢查〉（1959年2月3日），廣檔，325-1-496，頁32-36。
- ⑤⑫ 〈葉季壯關於出口工作情況的報告〉（1958年10月10日）、〈對外貿易部黨組報送出口交貨資料的幾點說明〉（1958年11月22日），載《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頁176-78。
- ⑤⑬ 廣東省外貿易局運輸辦公室：〈繼續苦戰力爭提前完成出口任務在運輸方面提出幾項措施與要求〉，頁5-6。
- ⑤⑭ 廣東省人民委員會：〈關於開放若干出口物資裝貨地點的通知〉（1958年10月18日），廣檔，235-1-227，頁17-25。

- ⑥⑦ 〈一九五八年全國對外貿易統計年報說明〉(1958年)，載《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頁84-85；徐德志等編著：《廣東對外經濟貿易史》，頁215。
- ⑥⑧ 廣東省外貿局：〈嚴亦峻局長在廣東省對外貿易工作會議總結發言〉(1958年12月16日)，廣檔，325-1-492，頁143-47。
- ⑥⑨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96。
- ⑥⑩ 《李先念傳》編寫組、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編：《李先念年譜》，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頁120。
- ⑥⑪ 外貿部在1958年10月23日曾提出，1959年要實現進口77.11億元、出口90億元，但後來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在11月21日將指標下調為進口70.11億元和出口83億元；到1959年1月23日更將指標降至進口63.2億元和出口79億元(於2月8日獲得中共中央同意)。參見〈對外貿易部黨組關於當前外貿工作上的幾項措施和對一九五九年進出口貨單調整意見的請示報告〉(195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轉對外貿易部黨組關於一九五九年進出口貨單調整意見的請示報告〉(1959年2月8日)，載《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頁91、94。
- ⑥⑫ 毛澤東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和11至12月的武昌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上開始對大躍進進行降溫，例如調整人民公社體制並壓縮過高的生產指標等。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66》，頁550-54；叢進：《1949-1989年的中國》，第二冊，〈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163-72。
- ⑥⑬⑭ 中國土畜產進出口總公司廣東省分公司：〈與民族獨立國家在港澳及市場上所發生的矛盾及有關調研資料：關於我國與民族獨立國家有交叉情形商品在港澳及東南亞市場上所發生的矛盾及提供今後意見〉(1959年)，廣檔，324-2-20，頁7-30。
- ⑥⑮ 〈對外貿易部黨組關於當前外貿工作上的幾項措施對一九五九年進出口貨單調整意見的請示報告〉(195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轉對外貿易部黨組關於一九五九年進出口貨單調整意見的請示報告〉(1959年2月8日)、〈對外貿易部黨組關於檢查對西方國家出口廢原棉問題的報告〉(1959年2月25日)，載《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頁91-96、404-406。
- ⑥⑯ 〈對外貿易部黨組關於當前外貿工作上的幾項措施和對一九五九年進出口貨單調整意見的請示報告〉、〈中共中央批轉對外貿易部黨組關於執行對外貿易計劃中存在問題的請示報告〉(1959年3月18日)，載《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頁91-93、96-100。
- ⑥⑰ 參見〈中俄匪幫對東南亞地區之經濟攻勢並日本之反響及對策〉，頁111-31。1959年中國和廣東省對資出口都有萎縮。參見〈一九五九年外貿收購、出口、進口、運輸計劃已經提前和超額完成〉(1960年1月14日)，載《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頁103；徐德志等編著：《廣東對外經濟貿易史》，頁216；廣東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東省志：對外經濟貿易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頁145。
- ⑥⑱ 參見Donna Lee and Brian Hocking, "Economic Diplomacy", in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0846626.013.384>。
- ⑥⑲ Alexander Eckste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terplay of Scarcity and Ideology*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5), 2-12。
- ⑥⑳ 相關研究的介紹，參見張軍：〈為《為增長而競爭》而寫〉，載張軍、周黎安編：《為增長而競爭：中國增長的政治經濟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2-4。
- ㉑ 參見Alexander Eckstein, *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Trade*, 183-84。

姚 昱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教授

李海媚 天津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博士生，廣東石油化工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